

主题研究: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

晚清中国人眼中的异域教育

——初出国门的外交官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

周谷平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晚清时期初出国门的外交官以“百闻不如一见,耳闻不如目睹”的切身感受,记录了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这些认识尽管不免肤浅,甚或谬误,但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异域教育的最初文本,在中西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关键词] 晚清中国; 外交官; 西方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1-0023-08

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沉重使命,尽管迈出这一步充满艰辛和屈辱,尽管这条路漫长而坎坷,但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人还是走出去了。初出国门的人中,既有通过科举正途跻身官僚队伍的驻外使节,也有关心祖国命运自费考察游历的文人学者,不管他们是在列强的逼迫下不得已纳入国际关系格局,还是为时势所动,自觉自愿地踏进异域,这些先知先觉者的足迹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百闻不如一见,耳闻不如目睹”,他们在国外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有了切身的感受 and 了解,而且通过比较和反思,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探索 and 追求。他们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被时人视为救国之根本的教育,这些见闻和见解虽不免肤浅,甚或谬误,但对当时的中国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本文拟对晚清初出国门的外交官对当时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作一梳理,以期中外教育交流史的历史轨迹添上不可或缺的一笔。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尽管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天朝大国”、“四海宾服”的中国中心观仍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心灵,朝贡和册封的关系仍被朝廷和顽固的官僚大臣视作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直至1860年,欧美列强才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公使在觐见中国皇帝时不用再行跪拜礼,政府公文中也不再用“夷”、“狄”称呼外国——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外交关系方面的事实和新观念。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清政府陆续派官员外出考察并将官员派驻到欧美各国。

[收稿日期] 2004-09-13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BAA010043)

[作者简介] 周谷平(1957-),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这一迟到的派遣始于 1866 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休假,他建议清政府派人随他到欧洲一游,借以了解海外情况。总理衙门深感中外隔膜,于对外交涉和兴办洋务颇为不利,便欣然接受建议。于是,由斌椿父子率领的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历史性地担当了第一批由清政府派赴泰西游历、亲自接触西方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等十余个国家,走马观花地游了一圈,然而却足已使斌椿发出“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慨。薄薄一册《乘槎笔记》记载了其所见所闻,短短的记载中也仅留下一条赴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的游记。游记中记载:“乘火轮车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阿(读作熬克)思佛,游大书院数处。掌院者名勒得富,邀至家。”^{[11](p.118)}这便是中国近代朝廷官员留下的考察国外教育的最早记录。

两年后,清政府正为同列强各国修订条约期限已近而不知所措,适逢美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卸任回国,于是清政府便聘请他率领一个中国外交团出访欧美,在 1868—1870 年间,历访美、英、法、普、俄等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主动派出的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在首次出使人员中就有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志刚在其《初使泰西记》中记载了使团的外交工作以及在异域的考察和游历。从严守夷夏大防中走出来的志刚在时势面前终于开始醒悟。他认识到:“使天下皆知与各国交际,所以筹国计而保民生者,实出于事势之不得不然。”^{[12](p.305)}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在美国纽约,志刚参观了大书院。他记载道:“本地富人古博尔者,老而无子,乃竭产独力建造大书院。凡西国所应学者,区以别之,各有教师。又各有男女学习之所。藏书之室,熔铁为架,倚壁成城。择人专司,许观不许借。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可谓善用其富者矣。”^{[12](p.268)}考察之际,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但西人各家学问与夫制造之法,仅得之时刻流览之间,无暇与之深究而详察,未免有遗憾焉”^{[12](p.316)}的感叹。

1876 年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清政府正式在英国设立我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馆。从此,郭嵩焘这个名字便与辱骂和褒扬声一起载入了这页史册。作为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是一位孤独的先行者,他既是完全按正途出身走完封建社会培育人才程序的士大夫精英,又因其家庭背景,具有儒商并重的思想,加上思想活跃,自信进取,喜议论、好批评的个性,在这一中西交汇的转型过渡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牺牲品,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从 1876 年底赴英至 1879 年 1 月撤任回国,在英国的两年时间里,郭嵩焘以其精通传统文化,熟悉封建政治,了解洋务内情的根底,将中西方、中西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他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对“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表示赞同^{[31](p.156)},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看到了国家政体的根本差异。他还考察了西方文明及其哲学、伦理思想,认为所谓的“夷狄”也有几千年的文明。他在日记中记述道,“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包括苏格拉底的“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柏拉图的“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论神有三位”;亚里士多德的“言学分里学、外学,里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等等。他同时指出:“(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31](pp.946-947)}“国人译述古代希腊哲学,盖以此为嚆矢”^{[41](p.33)}。对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郭嵩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比较。他认为:“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佛氏之法,则舍身以度济天下,下及鸟兽,皆所不遗。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遗也。”^{[31](p.62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郭嵩焘在英使任上对欧洲视为立国本原的科学和教育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早在出国之前他已深知:“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41](p.28)}出国途中,船经香港,他便“询及学馆”,并在当地大学馆总教习斯爵尔得陪同下参观了学校,看到“其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而感到“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31](pp.30-31)}。到

英国后,他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各类学校,从中看到了教育在泰西国势强盛、科技发达、民风养成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在伦敦写信给沈葆楨,力言中国当以教育为急务。他说:“……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房屋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4](p.29)}学校教育须重实学,才能造就有用人才,致国家于富强,这是郭嵩焘出国后的切肤之感。他认识到:“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3](p.385)}“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太西各国者”^{[3](p.190)},赞扬西方人才培养“学、仕两途相倚,不患无以自立,比较中国为胜”,如“西洋律学、医学皆可以求仕,学成亦可以治生”^{[3](p.621)}。

郭嵩焘对西方教育制度和各级各类学校均有较为直接的观察和了解,他的记述和评论为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参照和借鉴。郭嵩焘去过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在日记中,他详细记述了牛津大学的21个学院,所学科目“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及诸格致之学,皆择其所艺已成者试之乃得入”。了解了其导师制,“各以类设师程督之,率十许人,从一师”。又去参观了另外3所学校和大学图书馆,尤欣赏该图书馆不仅藏书量大,又有各国书籍,按国别分别放置,而且其中数十橱书均由近人著述并由其首纳献一部所集成,无需购买^{[3](pp.376-377)}。他还记下了当时全英8所大学的分布,大学授予学位典礼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大学考试过程,奖学金制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他写道:“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这与中国学仕合一的科举制度显然有别,对此,郭嵩焘感慨道:“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3](pp.378-380)}郭嵩焘还十分关注西方的强迫义务教育:“英国之法,三四岁以上皆入学。子弟不入学,坐罪家长。贫家习工业、充役,约以十二岁为断;仍听半日就工役,半日入学。至十六岁,乃听出学。”与义务教育阶段相衔接的是,“其年十六以上读书有成,乃入大学……俟其艺有专精,乃送入阿斯弗学馆(即牛津大学)……六七岁以下,妇人教之”^{[3](p.442)}。至于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所谓“西人尚学问,男女一也”^{[3](p.677)}。他记载道:“女子之学有专精,亦司教事……盖凡妇女入学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读,则就此学馆课以授读之方。如传授某艺应如何入门,如何分别次序,如何立言开导;使童子易明。如是两年……两年学成,国家遣人就试之,取中者记其名。乃令人各小学馆授读,试其能否,然后给以文凭,听人延请课读。”^{[3](p.435)}他对特殊教育,如英人所办之盲童学校也进行了考查,“虽瞽而读书办事之功皆可不废”^{[3](p.233)}。郭嵩焘对留学教育感受尤深,在英时,他目睹日本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急迫感和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他说:“日本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经营招致,进而未已。兼闻其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两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传曰:‘邻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盱食乎!”^{[3](p.948)}他进一步指出:“凡日本二十余人,皆通英国语言,中国不如远矣。”^{[3](p.166)}应该说,早在甲午之前,就有这样的见识,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是,他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4](pp.31-32)}郭嵩焘在看了李鸿章关于洋务的书信后尖锐地指出:“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语云:‘欲速则不达’。伯相之言,未免近于欲速者矣。”^{[3](p.512)}他希望中国留学生能摆脱只重军事、枪炮一途的做法,“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学生改习相度(勘探)煤铁及冶炼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4](p.32)},却被李鸿章借故推诿。

郭嵩焘在英期间不仅拜访了学部大臣,了解英国教育的整体情况,实地考察了各级各类学校,而且十分留意与教育关系密切的博物院、图书馆、印书局、各种学会和各类科学实验演示等,吸纳各

种新知识和先进经验。他还曾去法国,同样注意了解法国的学校教育情况,对其学校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经费、女子教育等均有详细记载^{[3](pp.597-705)}。短短两年的公使任期,郭嵩焘对西方、西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中国应向西方学习有了更为深切的感触和体悟。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3](p.491)}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在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两难困惑中总是痛苦和孤独的,郭嵩焘的见闻及议论不仅不为时人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受到封建顽固士大夫们的攻讦和弹劾。对此他只能十分无奈地叹道:“各国人才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崖,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愤愤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3](p.733)}

二

在郭嵩焘同时及稍后,还有一些外交官陆续出任海外,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如黎庶昌先作为参赞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光绪三年(1877),他改任驻德使馆参赞,随刘锡鸿去了柏林;第二年奉调赴巴黎,任驻法使馆参赞;1880年,他又任驻西班牙参赞,在马德里住了一年多,直到1881年回国;后又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在西洋各国的几年中,黎庶昌领略并记载了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情形,其中包括对学校教育的描述,如巴黎官学堂奖赏学业优秀学生及其颁奖典礼。他还特意提到,在颁奖中“又一生因称赞君主,不喜民政,为众所扶出,不使与赏”^{[5](pp.444-446)},颇有值得深思之处。他还介绍了巴黎盲童学校的情况,并称赞西班牙国君对学校的重视,“其国农务学堂开学,君主君后亲临,并视察学务”^{[5](p.463)};记述法国国家印书局虽是印刷各部应用官书文件之处,但“亦有文人学士所著之书,须先由各部验明其书果裨实用,始准发印,虽私,犹官也”^{[5](p.456)},说明法国政府对实用书籍的重视。他以亲身经历谆谆告诫:“庶昌于西洋语言文字素未通知,奉使一年,徒能窥观其大略,而无从细求。耿耿此心,用为憾事,以此益知出洋当以语言文字为先务也。”^{[5](p.542)}对于当时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西方不失为一良言。

这里尤须提及的一个人就是担任郭嵩焘驻英副使的刘锡鸿,他倾向保守,对西方各种新事物常以不屑一顾的语气言之,或以中学比附之。刘锡鸿以传统卫道士自居,贬斥西技、西器,认为它们不适于讲求礼义的中国,并坚持“用夏变夷”。即便如此,在英期间,他还是感受到了西方的文明、实学和教民之法。比如,他们的民主风气,“今观其会堂辩论得失,各不相假;迨事归一是,众遂俯首相从,不存胜负之见”^{[6](p.127)}。见识了西洋电学、热学、重学等各种实学及教育制度。他记载道:“英国教人之法,绅宦殷富或自延师,或公建学堂,以课子弟,皆不与贫儿混。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学徒皆居宿于塾,供其衣服、饮嗽,不听他出。人家生育子女,咸报乡官。乡官岁核户籍,省知已届五龄,即驱率入塾。初学教诵耶稣经,既长学书算勾股开方之法,是之谓小学。小学成,则令就工以谋食。其资禀特优者,益使习天文、机器、画工、医术、光学、化学、电学、气学、力学诸技艺,是之谓大学。大学之处,刊卜吏治(即剑桥大学)十书院,以光、化、电学为主。岳斯笏(即牛津大学)三十余书院,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又或舍巨舟为学塾,教练航海各工。总之,不离乎工商之事者近是。虽然,其教术则工商,其教规则礼乐也。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歌声乐节,孩而习之,无任差忒。每人其塾,规矩森肃。”^{[6](pp.207-208)}他还记载了:“(各类社会教育机构)莫不远近棋布,纵百姓男女观览摹效,以为学识之助。其各种机器,亦时集一区,运用演试,使人得审视之。”^{[6](p.208)}这些出自顽固守旧人士之手

的记述,即便只是无可奈何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向西方学习乃时势所迫,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

接替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在欧洲待了8年,他既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家学渊源,又有一定的西学基础和西文程度,这使他在出使期间为当时的弱国外交尽了很大的力。在国外,他同样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感受其富强之原。尽管他少发议论,鲜谈公事,但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仍可体会到他的观察和思考。如他看到民主共和的法国,“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71](p.169)}。曾纪泽在英国赴宴致词时表白自己:“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若使中国有公堂、保堂之分,则本爵宜列于公堂。”^{[71](p.218)}他称赞西人的专利之法:“西人思得良法,制一适用之物,国家许以独擅其利,若干年乃准分店学制。是以人人鼓励,研精覃思,趋之若鹜也。”^{[71](p.151)}对中西学问进行比较研究后,他认为,中华之小学乃文字、道德等童蒙基础,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么么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71](p.177)}。他还建议:“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文则声气相孚,可以扶幽洞微,暗获助益……其效甚速而远。”^{[71](p.211)}这已涉及中西沟通和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途径,可谓教育国际化之先声。

另外,在清末出洋的外交官中,由洋务而变法的薛福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潜心传统的“经世之学”,又长期担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政治经验。在洋务派中,他很早就提出“变法”的主张,发表著名的《筹洋刍议》,大声疾呼今日之天下已不是“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1890年,他接替刘瑞芬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在欧洲度过了四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努力探索西洋富强之本原,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及其政治文明,并在比较思考的同时,详加记载,以备采择。他在出使日记中专门记载了当时总理衙门拟订的《奏定酌拟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游历应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电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负有性情相近者,自能审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81](p.172)}薛福成不但这样记了,也这样做了,可谓尽心竭力。正如他在《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日记·自序》中所言:“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81](p.61)}

薛福成出洋后,对于世界大势及向西方学习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切身感受,他深切体会到世界变化之神速,进化“固系宇宙间自然之理”。他多次反复表明:“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81](p.231)}“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81](p.83)}他在领略了西方各国的政治教化、工商科技后认为:“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讳疾忌医也。若谓学步不易,而虑终不能胜人,是因噎废食也。”^{[81](p.133)}他于政体推崇英、意诸国的君民共主,这显然比当时中国的君主专制要来得民主。他对于西国富强之本原的养民教民之法尤为欣赏:所谓养民者,兴工商、重实学也,商为“握四民之纲者”,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民生百业,“皆导其源于气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81](p.132)}。但长期以来,中国士大夫“多糜于时文试贴小楷之中”,“鄙弃工艺而不屑道”,致使中国在近代国贫民弱。至于教民之法,薛福成也作了长篇阐述。他说:“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暗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

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其书多,曲折该备,有读之十年不能罄其奥者……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81](pp. 290-291)}他在描述了欧美各国教育现状后,盛赞“西洋诸国武备日新,文教亦蒸蒸日上^{[81](p. 775)}”。由此主张中国应全面效法西方,中国人聪明才智毫不逊于西人,一定能青出于蓝,师之而胜之。

在中国早期派出的外交官使团中,常有随员一同前往,他们在亲身游历后,也留下了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记述和感想。曾多次随团出使,先后八次出国,后又任出使英国大臣的京师同文馆第一届学生张德彝便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在 1866 年随斌椿游历欧洲留下的《航海述奇》中,他记下了英国“凡有国政会议,其可否悉以众论而决^{[91](p. 521)}”;描述了伦敦的报馆、大学院以及学科专业设置和学位制度。他在文中说:“泰西取士,亦有秀才、举人、进士之名。应试者专攻一艺,或文章,或算学,或天文、地理,或术学、医道,或化学,或格物,其他或由吏部选拔,或由廷臣荐举。”^{[91](p. 521)}他在 1868 年随蒲安臣使团访问美、英、法诸国留下的《欧美环游记》中记述了美国义社的状况:“(该义社)系富翁古柏尔建造,高楼周十余里,广置天下书籍画本、石人泥像,令郡内居民学习,或读或画,或塑或刻,听其自便,一切支应皆伊供给。”^{[101](p. 653)}义书堂,亦由名人建造,“周十五里,白石层楼,内储各国古今书籍七万五千余卷,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以广见闻^{[101](p. 653)}”。他还记载了当地的孤儿院:“周数十里,四面花园,中建大楼十数处,养郡内孤独无告之人。女子教以针黹,男子教以兵法。男女各有读书燕息之所。饮食衣服,一律周备。”^{[101](p. 653)}在法国,他看到“凡官学义学之幼童幼女,晨夕往来,皆以大车接送^{[101](p. 747)}”。在 1876 年随郭嵩焘使英及随后的使俄中,张德彝又有众多的见闻和议论,如记录了英国的国民教育。他说:“盖人民及岁,必令读书。所学之文,非章句词赋,乃天文地理,算学格物也。”^{[111](p. 357)}还记载了英国的实学及各级各类学校概况,俄国普及教育的进展,等等。他尤注意到西方人重视创造发明,认为“如能创造一物,有益于人工地利,或较其已用者尤为精巧,则公私所获,一生用之不竭,其著作实学书籍,则千古不朽矣^{[111](p. 785)}”。并由此醒悟到不能以学习他国为耻。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强国之策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卓有成效、迅速崛起的近邻日本。1871 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又互设了公使馆,我国首任驻日公使是何如璋。1877 年底,他与使团一行十余人抵日,翻开了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随何如璋出使的参赞黄遵宪,在日期间目睹日本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破除国人、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的狭隘目光,经过艰苦的努力,广泛搜集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煌煌巨著《日本国志》。该书 40 卷 50 万字,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内容十分丰富,从各个角度叙述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实行的各项制度,强调中国应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以臻富强。在书中,作者大力提倡各国之间的交流,认为“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121](p. 275)}”。他肯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注重富国强兵和科技实学,主张中学、西学兼而用之。黄遵宪极力推崇实学的作用,认为“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也^{[131](p. 203)}”;批评“后世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以致“实学荒矣^{[131](p. 203)}”;对日本学习西学、重视教育的主动性及成效大为赞赏,称其“既遣大使巡览欧洲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又于明治 4 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一方面“争延西人为之教师”,另一方面有大批公费、私费学生留学国外,同时兴建各种文化教育设施^{[131](p. 203)}。《日本国志·学术志》评述了日本学习西方的历程:“明治元年,

海外留学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14](p.396)}黄遵宪还撰有《日本杂事诗》一部,同样突出提到教育在立国兴国中的重要作用,可视为《日本国志》的诗歌版。除黄遵宪外,历任驻日使馆中还有不少有心人,如姚文栋编《东槎杂著》,陈家麟编《东槎闻见录》等。此外,甲午战前,清政府还派遣一些官员以观光、游历等名义赴日,他们也留下了自己的记述。如1879年赴日的王之春作《谈瀛录》,1880年赴日的李筱圃作《日本纪游》,1889年赴日的傅云龙作《游历日本图经》,等等,他们均为中日文化教育交流付出了心血^{[12](pp.16-17)}。

晚清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是从闭关走向开放的转折时期,在屈辱挨打的危机面前,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向西方遣使既是外交的需要,也是了解西方的绝好途径,于是,便有了这迟到的派遣。尽管当时的中国对西方的真实情况了解并不多,而且这些使臣中,既有政治倾向的差异,也有阅历和出身背景的不同;有的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有的还带着有色眼镜,甚或谬误,但由于这些使臣多数是晚清近代化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属于比较积极地主张学习西方,以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局面的站在时代前列者,因此,他们在出国前通过阅读洋务书刊,和西方人以及通晓洋务的人士交往,或多或少地为他们不辱使命提供了思想和知识的资源。在身临其境之后,沐浴了欧风美雨,均不同程度地对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注意到了坚船利炮背后的政教制度、礼义文明,看到了其崇尚实学、鼓励发明的先进制度,对立国、强国之本原的教育也给予了真切的关注,他们以各种形式记述、传达的西方新教育信息,无疑为中国教育尽快融入世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范本。不可否认,在时代大潮风云际会之时,他们主动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仅在中西外交史上,而且在中西教育交流史上也都留下了鲜明而坚实的印记。

[参 考 文 献]

- [1] 斌椿. 乘槎笔记·诗二种[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 志刚. 初使泰西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3] 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4.
- [4] 钟叔河. 叙论·论郭嵩焘[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4.
- [5] 黎庶昌. 西洋杂志[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6] 刘锡鸿. 英轺私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7]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8] 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日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9] 张德彝. 航海述奇[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0] 张德彝. 欧美环游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1]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A].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C].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12] 王晓秋. 大庭修.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C].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13] 瞿林东. 开眼看世界——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J]. 社会科学战线,1993,(2):196-203.
- [14] 钟叔河.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穹]

Foreign Education as View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Western Education Held by the
Diplomats who Went Abroad for the First Time

ZHOU Gep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about the Western education which the diploma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rote down on their first trip abroad.

Chronologically, the paper begins from the late 1860s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dispatched diplomats to Europe and America for investigation and special mission. The first such trip can be traced back to 1866, in which Sir Robert Hart (1835—1911),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from 1863 to 1908, led a delegation on an investigation tour with Bin Chun and his s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diplomats went abroad in success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mong whom being Guo Song-tao, the first envoy to the UK and Xue Fu-cheng, a great political reformer after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Being participants in and supporters of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y were really shocked and impressed and influenced by Western values, thoughts and culture, despite their discrepanci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inclination, 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and world outlook and personal purpose. Not only did they observe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trong weapons,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etiquette behind them, but understood the new Western education being the principle of strong and prosperous Western countries. Moreover, they kept a record of the western educ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and aspects, while expressing their own views and opinions, which offered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models for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that must catch up with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this particular part of history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diplomats; Western education

第一届“话语与东西方文化发展”国际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

话语学作为一门从语言切入的社会文化研究,正推动着国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组、发展和反思。2004年10月,由浙江大学话语与多元文化研究所发起召开的“话语与东西方文化发展”国际会议,对推动这一前沿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将产生开创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次会议打破了话语与文化研究长期由西方强势话语垄断的状况,第一次在中国把来自二十多个国家,代表不同文化、信仰,不同社会发展背景和学科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运用话语研究来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与社会进步,因而,这是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事件。E. Burman、N. Fairclough、顾曰国、R. Maier、R. Nair、N. Parede-Canilao、I. Parker等7位专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们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学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现代话语的冲突、支配、变迁、发展、协调等课题。本次会议还产生了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浙江大学施旭教授)主编的国际性学术杂志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和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主导的话语与多元文化国际协会。

(吴宗杰)